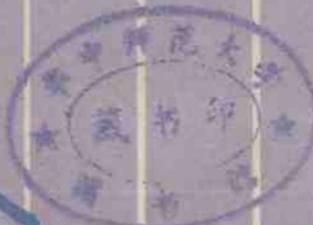


清代五十家文選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李茂肅
选注



清代五十家文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

李茂肃 选注



清代五十家文选

李茂肃 选注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电话：615710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340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9—0521—7

1·457 定价：6.40元

卷之二

清宣统二年，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自称“网罗未广，疏漏正多”，但已收录“一千三百余家，文一万馀篇”。黄摩西为该书写序言说：“吾朝文治，轶迈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众长”，“与古为新，无美不具。”黄摩西的话未必全对，但已可看出，清代之文作品如海，作家如林，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当然明清时期的文学主要成就是小说、戏曲，但对清文也不宜评价过低。从整体情况来看，清文之成就逊于唐宋，但超逾元明是可肯定的，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它是继唐宋之后再次出现的散文写作的艺术高峰。特别清代初年的散文，成就更为可观，中期以后，以袁枚为代表的作家作品的出现，是清文发展中的波澜，并为晚清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桐城派”作家也写了些好的文章。清代经学、考据之学甚盛，一些潜心著述的学者，也写了些优秀的散文或骈文。这是对清文发展和成就的基本估计。

前　　言

清宣统二年，沈粹芬等编选《国朝文汇》，自称“网罗未广，疏漏正多”，但已收录“一千三百余家，文一万馀篇”。黄摩西为该书写序言说：“吾朝文治，轶迈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众长”，“与古为新，无美不具。”黄摩西的话未必全对，但已可看出，清代之文作品如海，作家如林，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当然明清时期的文学主要成就是小说、戏曲，但对清文也不宜评价过低。从整体情况来看，清文之成就逊于唐宋，但超逾元明是可肯定的，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它是继唐宋之后再次出现的散文写作的艺术高峰。特别清代初年的散文，成就更为可观，中期以后，以袁枚为代表的作家作品的出现，是清文发展中的波澜，并为晚清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桐城派”作家也写了些好的文章。清代经学、考据之学甚盛，一些潜心著述的学者，也写了些优秀的散文或骈文。这是对清文发展和成就的基本估计。

众所周知，明代文艺思想斗争尖锐，而“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主张，统治时间较长，虽经“唐宋派”、“公安派”的冲击，但余波延续，影响很深，因此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重要任务，仍是清除复古摹拟的影响，总结文艺斗争的经验，为发展当时的文学创作服务。明

末清初的几位大师，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在民族斗争的磨难和黑暗现实的经历中承担了这一任务。当前学术界，对钱谦益的评论颇不一致，但就其文学活动来说，贡献是很大的。只要看一下他的《答唐训导汝溥论文书》、《题怀庵堂诗钞》和《题归太仆文集》等，即可发现他的文艺观点十分明确，在反对文学复古、正确评价“公安”、“竟陵”和发扬优秀艺术传统方面，是多有卓见的。特别顾炎武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的口号，强调作家考察“民隐”。黄宗羲联系当时的民族斗争，大力表彰“孤愤绝人”和“惊世骇俗”（《缩斋文集序》）的言论。魏禧告诫学人要“恢宏其志气，砥砺其实用”（《答南丰李作谋书》），联系现实，写出有益于世的文章。这些观点，清楚表现了明末清初的文艺理论，是在总结过去文艺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使文学写作向反映现实、有益社会的方向发展。这是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某些进步文人的意识形态中的反映，也是清初散文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此外，上述大师对学习古人和进行创作、对文学艺术的特点等问题，也多有论述。这样就把文学创作置之于健康发展的道路。

清初散文的发展是成绩卓著的。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可说是划时代的作品。作者在《原君》中，冲破“君权神授”、天子独尊的儒家传统思想，指斥皇帝“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文章充满了朴素民主思想，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清统治者，而且触及到反对君主专制的问题。清初文网严密，而作者却写出这样有批判精神的文章，真如雷惊电驰，划破了黑暗的时代长空。梁启超称赞这篇文章“极大胆之创论”，对“晚清思想之骤变”起了促进作用。（《清代学术概论》）又如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强调“行已有耻”，重视民族气节，写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立足当世，反思历史，卓有成就的佳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在《日知录》中提出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涉及农田水

利、矿产、交通、赋役、兵防等问题的研究，表现了作者关心国计民生，探讨“利”、“病”，复兴国家的强烈愿望。

清初散文作家甚多，影响较大的还有归庄、宋琬、王弘撰、施闰章、廖燕以及世称“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汪琬等。这些作家各以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特点抒发感情，反映当时的社会。施闰章的《送杜蕃舒归里序》，用对话的形式表现了自己为政清廉的思想和品格。周容的《芋老人传》，用讲故事的形式深刻阐述了“时位之移人”的道理，并给一般读书人敲起了警钟。这些文章表现了文笔灵活，取材宽广的特点。在“清初三大家”中，魏禧的文章以观点超越、分析事理精辟见长；汪琬的文章又以写人状物文笔生动取胜。侯方域的散文影响更大，他学习韩愈、欧阳修，既有韩文之博大和气势浩瀚的特点，也得欧文委曲详尽、情意缠绵的表现手法。他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文笔委婉犀利，义正词严，揭露了阉党惊草阮大铖阴谋陷害复社成员的罪恶，也表现了他自己不畏权势的斗争精神。他的《李姬传》、《马伶传》，刻画人物鲜明生动，并具有小说的某些特点。三位作家各自不同的风貌，标志着清初散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当然，清代初年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女真族贵族统治者的侵扰，激起汉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的反抗，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达三十年之久。因此歌颂抗清斗争，歌颂斗争中殉难的英雄，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写作主题。汪琬的《江天一传》、姜宸英的《奇零草序》、邵长衡的《阉党史传》，还有时间稍晚的全祖望的《梅花岭记》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作者以悲咽难忍的心情，义正词严地揭露了侵扰者的罪行，歌颂了大义凛然为国捐躯的志士。《阉党史传》中的阉党史，在敌众我寡，被敌围困的孤城中，率领军民浴血奋战，坚持斗争达三月之久。《江天一传》中的江天一，在战败被俘后，面对敌人的将领，昂首挺胸地说：“我为若计，若不如杀我；我不死，必复起兵！”真是视死如归，义薄云天。黄摩西评论这类文章：“云雷郁勃，

风涛轩怒，震国民之耳鼓，至今渊渊作响。”（《国朝文汇序》）这一评论还是中肯切要的。当然这些殉难志士和歌颂他们的文章，其主导思想是属封建思想体系忠君爱国的范畴，有严重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的崇高民族气节。

二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经济状况的恢复与发展，康熙中后期文坛上出现了“桐城派”，这是一个势力相当雄厚的文学流派，占领文坛达二百年之久。先驱者是戴名世，创始人是方苞，相继出现的是刘大櫆、姚鼐等。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称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流派为“桐城派”。乾、嘉时期为其鼎盛时代。

戴名世提出：“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的写作主张，为方苞所接受，奠定了桐城派文学理论的基础。但是在政治倾向上，戴名世与方苞却并不完全相同，戴悼念明王朝的灭亡，揭露清王朝的统治，有“离”“异”思想。因此被坏人告密，死于“《南山集》狱”。其后桐城派不承认戴为其实学派的先驱，这是极不公正的。

如上所述，戴名世表现了对清王朝的离异，而方苞则表现了从离异到归服的转变。他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继戴名世文学理论之后，提出文章“义法”的主张。并解释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书货殖传后》）从表面上看是讲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但这里的内容是特指“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古文约选序例》）要“本乎”经术，更迷惑人的宣扬程朱理学。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界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先生文集序》）可见方苞的文章“义法”，实则用散文的形式宣扬程朱理学。

这与当时进步的思想是相抵触的。清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五十一年，将朱熹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提升到大成殿“十哲”的地位，就是这种思想的明显表现，而方苞的理论正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文章“义法”的落后和保守性是非常清楚的。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喊出打倒“桐城谬种”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种文学流派的兴起和发展，其情况是复杂的。既有作家之不同，又有具体作品和艺术风格之各异，何况就是同一作者的思想也是有发展变化和矛盾的，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桐城派的散文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价值。学术界常称方（苞）、刘（大櫆）、姚（鼐）为“桐城三祖”，就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吧。

方苞的思想是有发展变化和矛盾的，在未受到清王朝重视以前，他曾因“《南山集》案”的牵连坐过监狱，写了《狱中杂记》，揭露当时狱治黑暗的情况。他撰写了《左忠毅公逸事》、《田间先生墓表》等，歌颂抗清将领和隐居不仕清朝的志士。他的《辕马说》、《逆旅小子》等，都是社会意义深刻的寓言小品。他写文章注意篇章结构，文字凝炼雅洁，表现出一种凝重简朴的审美思想。他提倡写散文，反对八股时文，对促进散文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刘大櫆，虽不是方苞的门生，但他推崇方苞，并以“义法”为基础，提出“神、气”说的理论，是有益于散文的写作的。他仕途坎坷，社会地位低下，比较接触现实。在《万柳堂记》、《愚吠一首别张渭南》等作品中，表现了对达官贵人的不同看法和愤世嫉俗的思想。他不满于清王朝统治的社会现实，经常发出怀才不遇的慨叹。他的《论文偶记》涉及对散文艺术写作经验的总结。他行文恣肆，不那么温柔敦厚。吴汝纶就曾用“绚烂闳肆”（《与杨伯衡论方刘姚三集书》）四个字评价过他的文章。

姚鼐是刘大櫆的学生，他继承方、刘的文艺思想，结合当时经学、考据之学盛行的特点，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的文学主

张，既有克服桐城派散文内容空泛的意义，又强调了文学特性的文彩，丰富和发展了文章“义法”的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吸收了诗话论诗的特点，提出散文的艺术风格问题。认为散文有“阴阳刚柔”之分，得于阳刚之美者，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决大川。”得于阴柔之美者，“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复鲁絜非书》）并认为艺术风格与“为文者”的思想感情有关。当然离开文章的内容议论文章的艺术风格是不恰当的，但是姚鼐总是看到并强调了这一问题，也是难能可贵的。

姚鼐的文章，写得生动流畅，结构严谨，精于炼字琢句。他的《袁随园君墓志铭》、《刘海峰先生八十寿辰序》、《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由于他提倡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古文辞类纂》序）因此他的文章具有迂徐深婉，意蕴丰厚的艺术特点。近代学者刘师培在他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虽不满意于桐城派文风，但仍认为“惟姬传之丰韵……则又近今之绝作也。”姚鼐的文学活动及写作实践，扩大了影响，巩固了桐城派的文学阵地。

方、刘、姚之后，桐城派的后起之秀还很多，重要的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分别在不同方面，为散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梅曾亮曾提出“文随时变”的观点，认为“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答朱丹木书》），这对写文章要顺应时势，及时反应现实，是有促进作用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记瞿民事》、《赠林侍郎序》等富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在桐城派的影响下，还出现了“阳湖派”、“湘乡派”、“侯官派”。“阳湖派”出现较早，代表人物是恽敬、张惠言。“湘乡派”出现于道、咸年间，代表人物为曾国藩。此后侯官（今福建福州）严复、林纾等人，论文常以桐城为宗旨，因而被称为“侯官派”。这些文学流派与桐城派的关系，当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以出现较早的“阳湖派”而论，恽敬、张惠言曾学习桐城派的散文，但又不满于这个流

派，恽敬批判方苞才力薄弱，“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羸。”《上曹德望侍郎书》因此进一步研究各流派之间的关系及其评价，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三

桐城派占领文坛的时间较长，但在清代作品如海、作家如林的文坛艺苑中，桐城派不是一花独放，而是与万卉争艳，各呈芬芳。与桐城派同时出现的，是一些不受文学流派的拘束，广泛接受文学传统，挥毫自如，各抒己见的作家和作品。其中有努力从事写作的文学家，如袁枚、胡天游、蒋士铨等。有别具专擅，但又爱好散文写作的学者，包括一些思想家、经学家、考据学家、历史学家，乃至画家、艺术家等。《四库全书》的总裁官纪昀、历史学家章学诚、经学家钱大昕等，都写了些思想性强、艺术性高的名篇佳作。此外，还有一些作者社会地位不高，但有个别散文作品为后世所传诵。因此清代的文坛，不仅诗歌创作辉煌灿烂，同时散文的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桐城派同时活跃文坛的作家中，有一些是思想比较解放，艺术才能高超的人物。他们不仅不受桐城派的约束，而且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画家郑燮（板桥），他虽专擅绘画和书法，但也爱好诗歌和散文的写作，在文艺思想上深受明代“公安派”和徐渭的影响。他反对“学古”、“泥古”，主张“标新领异”、“自出已意”。（《郑板桥集·板桥自序》）他的散文直抒胸臆，朴素自然，他的篆书叙述家常无所不谈，评论世俗脱口而出，形成独特的“郑板桥家书”的艺术风格，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袁枚与姚鼐是基本同时代的人，袁枚稍大而两人是要好的朋友；但在学术观点和文艺思想方面却完全不同。袁枚思想解放，艺术风格勇于创新，是乾、嘉时期卓立文坛的一面旗帜。他怀疑儒家

传统，提出“六经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当。”（《小仓山房文集·答定宇第二书》）他不问世俗，指责盛行当时的“宋学”（即程朱理学）为“心性之说近玄虚”。（《小仓山房文集·答惠定宇书》）批评当时的“汉学”（即考据学）为“笺注之说多附会”。（同上）对桐城派古文也不那么欣赏，批评方苞的文章内容空洞，取材单调，行文过分拘谨，不能“吃得住一个大题目”。（《小仓山房文集·答孙甫之》）袁枚的文学观点，受明代思想家李贽和进步文学流派“公安派”的影响，主张“性录说”。要求写作要“自出心裁”，率直而有个性。艺术构思要如“飞兔流星，超山越海”。（《小仓山房文集·牍外余言》）因此他的散文构思新颖，感情充沛，想象丰富，有浪漫色彩。如他的《游黄山记》，不仅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而且穿插一些心理活动的描写，使文意新颖，别开生面，可放可收。

袁枚还提出，写文章要委婉曲折，波浪起伏。“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纤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搅激者有文。”（《小仓山房尺牍·与韩绍真》）因此他的抒情散文多委婉纤徐，感情真挚。记叙文多波浪起伏，故事性强。他的《祭妹文》是哀祭文中的名篇，《书鲁亮侪事》故事性强，吸收小说的表现手法，为传记文学中构思特异的作品。

在遣词造句方面，袁枚主张“人云亦云之语，陈陈相因的话头，尤宜扫而空之。”（《小仓山房尺牍·答孙甫之》）这种要求语言创新的精神，也是值得注意和学习的。

乾、嘉时期骈文兴起，文坛风彩更加绚丽。由于乾、嘉学人深通经史，学有本原，修辞用事，都有根据，这就有利于骈文的兴起。因此乾、嘉学人中多骈文能手，影响较大的有汪中、孙星衍、洪亮吉等。特别对汪中应加重视。

汪中，出身贫苦，遭遇坎坷，以当幕僚和为人校勘书籍为生。他学习刻苦，博览群籍，学识渊博，精于考据之学。尊崇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等人，学术思想受其影响。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程朱理

学，鄙视方苞的散文，擅长骈文。他的《哀监船文》、《吊黄祖文》、《狐父之盗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等，都是骈文中的名篇。在《经旧苑吊马守真文》中，公开歌颂妓女马守真，同情她的遭遇，赞扬她的绘画才能；在《狐父之盗颂》中，歌颂一个强盗用饭喂活了一个饥饿将死的人。文章最后发表议论道：“吁嗟子盗，孰如其仁”；“孰为盗者，吾将托焉。”公开歌颂强盗和妓女，真是大胆行为，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蔑视。汪中的骈文冲破了传统骈文形式的约束，骈中有散，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主，这又表现了他改造和创新的文艺观点。

骈文的形式对作者思想束缚较大，但在清代的乾、嘉时期，一度出现所谓“骈文中兴”的情况，丰富了清代的文苑，还是应予重视和研究的。

四

清朝统治二百来年，乾隆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嘉庆时期开始走下坡道。随着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再加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社会力量的发展，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腐朽和反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了道光年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为激化。

做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在分裂变化和斗争之中。这时的桐城派更加暴露了它的落后和反动性，“湘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中兴”桐城派的梦想固然很快化为泡影，就是被称为桐城派殿军的林纾，也喊出了“沉溺其中，便成薄弱”（《桐城派古文说》）的呼声。一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目击社会问题的严重，正酝酿着变法图强，革新政治与文艺。“未雨之鸟，戚于飘摇”，“将萎之华，惨于槁木”。（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在时代

风雨的激荡中，龚自珍、魏源出现了；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潮走上了文坛，肇萌启后，继往开来，一场改良文艺，革新散文的历史风暴将要开始了。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目睹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亢声疾呼“更法”、“改图”、变革现实。他的散文思想性强，艺术性高，有很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明良论》闪烁着批判现实的光辉，《乙丙之际著议》、《平均篇》等洋溢着变法图强的思想，《病梅馆记》、《尊隐》、《捕蜮》等，又借题发挥，寓意深刻地指责社会的黑暗，憧憬未来的前景。他的一些书信、序文、传记、游记等，大多立意新颖，文笔奇丽，不同凡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可见其影响。

龚自珍死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的斗争进入反帝反封建的阶段。随着变法图强、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影响下，文艺界也进行着剧烈的变化。梁启超改革散文，倡导“新文体”，为社会所接受，我国散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像历史分期一样，本书选文至鸦片战争截止。共选入五十一家，九十篇文章。按历史发展的顺序，选录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注意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注意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格和艺术特色，力求体现清代文苑百花争艳的艺术风貌。

每篇文章有作者介绍，作品说明和注释。作者介绍力求概括扼要，作品说明力求揭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避免泛泛而论；注释力求准确详实，通俗易懂，以供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之读者阅读。

选注过程中，受到业师庄维石教授和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的

关心和指导。庄先生在选文方面多所帮助，袁先生在注释方面进行了修订，直到定稿。对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本书为山东省教委古籍整理规划项目，选注过程中曾得到省教委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关心和资助，以并表示感谢！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选注者

目 录

前 言	1
钱谦益三篇	
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	1
题归大仆文集	8
玉蕊轩记	12
黄宗羲四篇	
原君	16
原臣	21
祭万悔庵文	26
万里寻兄记	30
彭士望一篇	
九牛坝观抵戏记	34
归庄一篇	
送周孝逸游燕序	43
顾炎武三篇	
《日知录》论文三则	47
与潘次耕札	54
复庵记	56
王弘撰一篇	

与赵翼退大参考	60
宋起凤一篇	
核工记	66
宋琬二篇	
梅花盦虫记	70
湖上奇云记	73
侯方域三篇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77
李姬传	83
马伶传	87
施闰章二篇	
趵突泉来鹤桥记	93
送杜蕃舒归里序	97
尤侗二篇	
掘青亭记	102
盜说	105
周容二篇	
芋老人传	107
小港渡者	112
毛奇龄一篇	
重刻《扬椒山集》序	114
魏禧二篇	
答南丰李作谋书	122
《宗子发文集》序	127
汪琬四篇	
周忠介公遗事	132
答陈孺公书	139
陶渊明像赞并序	143

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	147
姜宸英一篇	
《奇零草》序	150
朱彝尊二篇	
书《宋史·张浚传》后	155
《看竹图》记	159
唐甄二篇	
大命	162
室语	165
王士禛四篇	
《西堂全集》序	170
《池北偶谈》自序	174
跋陆放翁诗	176
诗话四则	178
郑日奎二篇	
醉书斋记	183
与邓卫玉书	187
宋荦一篇	
游姑苏台记	193
邵长蘅一篇	
阅典史传	197
蒲松龄一篇	
《聊斋》自志	207
潘耒一篇	
《徐霞客游记》序	213
王源二篇	
送孔东塘户部归石门山序	220
真州游桃花坞记	223